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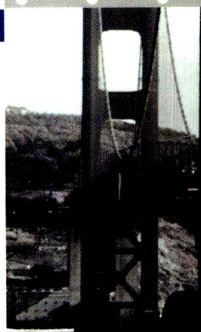
中山大学社会学文库

国与家之间

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

Between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An Ethnography of the Civil Associations and Community
Movements in a Shanghai *Lilong* Neighborhood

朱健刚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与家之间

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

Between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An Ethnography of the Civil Associations and Community
Movements in a Shanghai *Lilong* Neighborhood

朱健刚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朱健刚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1
(中山大学社会学文库)
ISBN 978-7-5097-1855-1

I. ①国… II. ①朱… III. ①市民-社会团体-研究-上海市-
现代②社会运动-研究-上海市-现代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9817 号

· 中山大学社会学文库 ·

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

著 者 / 朱健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负责 / 王 绯

责任编辑 / 胡 涛

责任校对 / 高建春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6.2 字 数 / 270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855-1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摘 要

本书试图探讨上海里弄 1980 年以来邻里中的市民团体、居民运动和相关的地方政府的实践过程。其核心问题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这些平行的基层组织和集体行动是如何在国家权力的变迁中被建构（再构）和被诠释的，这些组织和运动暗含怎样的权力和反抗关系；它们与中国政治社会的总体变迁，尤其是与所谓公民社会的建构以及公民性的形成，有着怎样的潜在的联系。

通过对上海一个叫做平民村的里弄的场景描述和历史追述，本书试图说明里弄邻里本身并不是一个先定的社会实体，而是一系列以居住地为地理区位的社会关系的组合以及居民自身的居住认同所共同建构的公共空间。它一方面受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后又受到房地产发展商等市场力量的改造；另一方面也随着邻里内居民的互动、交往和认同的变化而变化。其中，国家权力的渗透和家庭参与是邻里这一公共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

本书着重分析了在邻里空间中国家权力的主要表现方式和家庭参与邻里生活的各种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关于家园的价值观。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地方经济增长和基层政治的稳定是地方权力的主要目标。而房地产业的进入，家庭从国家的控制中逐步解放使得街区内的权力呈现多元化趋势。

在这样的正式权力的背景下，作者分析了两类主要的市民团体：一类是社区治理型组织，主要是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另一类是社区服务性组织，尤其是各类志愿团体。居委会作为占主导

地位的组织，它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权威来实现对邻里的治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资源有限以及直接面对家庭，它又依赖于它的草根动员网络、组织与居民之间的信任以及组织和积极分子之间的互惠关系来完成它的组织目标。而其他新兴市民组织比居委会表现出更多的自治性质。

与这些市民团体相关联的是居民的集体行动，它包括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群众运动和居民自下而上的维权运动。这两类运动都以邻里为基础展开，两者都需要动员居民的参与，而居民可以采取较真的策略来实现自己的居住权益，但同时也促进了基层治理逻辑的变更。不过，两者同时也都不断巩固了国家的权威。

通过对这些组织和运动的民族志描述，作者试图指出：在里弄邻里中，各类市民团体和邻里运动推动了邻里公共空间的生产，它们构成了邻里中的草根参与网络、相互信任的关系以及普遍互惠的规范。这些组织和行动一方面表达着国家权力的渗透，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国家权力关系的抵制和扭曲。这种依赖和自治的双重特征使得这些地方性的零碎的组织和“社会运动的日常形式”不构成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要素，它们所构成的底层的抗争也很容易被国家权力所吸纳，但是这种抗争在被吸纳的过程中又促进地方权力自身话语和实践的改变，在权威机制自身发生变革时，这些组织与行动所形成的网络和规范为民主化转型提供了可用的社会资本。

目 录

摘 要	1
导 论	1
一 理论综述	6
二 方法论笔记	16
三 内容架构	20
第一章 平民社区：邻里空间的割裂与整合	24
一 居民区的场景	25
二 三个世界：空间、权力和日常生活的互动	30
三 一天循环中的公共空间的生产	40
四 公共空间生产的动力	49
第二章 吴街的历史演变	52
一 下只角与“苏北人”	52
二 平民村的由来	53
三 解放：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建构	56
四 群众运动	60
五 改革年代：邻里的衰落与复兴	61
第三章 家庭、家的呈现与家园的想象	65
一 家庭的构成	65
二 户籍：控制的松弛与庇护	69
三 “有房子，才有家”	70

四	两种家庭主义与家园的想象	73
第四章	国家及其代理人	79
一	街居制的历史实践	80
二	党的网络	97
三	警察与执法	100
四	福利与救济	102
五	发展商与物业管理：新的权力进入	104
第五章	自治的张力：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	109
一	居委会：等级与网络	109
二	居委会干部	117
三	行动的分类：行政、裁决和庇护	124
四	人情、礼物与关系	128
五	求情、象征和女性	131
六	狗咬了书记：关于权力关系的个案	134
七	业主委员会的由来	142
八	业主委员会的产生与运作	146
九	冲突与谈判：业主委员会与居委会	154
第六章	新兴的市民志愿团体	157
一	背景与渊源	157
二	居民服务团队	160
三	拳操队和巡逻队	164
四	外来者：热爱家园的平民村工作站	168
五	小结：自助、互助与他助	183
第七章	建设社区	187
一	社区建设的兴起：邻里之外的运动	189
二	社会戏剧的假戏真做：邻里之间的社区建设	209

三 小结	226
第八章 “还我阳光，还我绿地”	228
一 城市问题与分析框架	228
二 忍与闹：日常抗争的文化	230
三 社区问题与集体行动的产生	233
四 还我阳光：争取阳光权运动	238
五 “谁的绿地，谁的国家”	246
六 小结	269
结 论	272
一 邻里中的公民性：社会资本与话语变迁	273
二 转型中国的地方权力与抗争	281
三 邻里：国与家之间的流动的公共空间	285
参考文献	289
致 谢	313

图 表 目 录

图 1 平民居民区略图	26
图 2 吴街地图	27
图 3 平民居民区（局部）	30
图 4 “三个世界”	31
图 5 废弃的门坊	32
图 6 平民村的弄堂	32
图 7 歧义弄的新公房	37
图 8 梅坊小区	38
图 9 街居制	82
图 10 80 年代初街道办事处组织结构	91
图 11 街区的行政权力结构	92
图 12 条块权能重叠	96
图 13 基层党组织体系	100
图 14 居委会组织卫生活动	125
图 15 居委会慰问孤老	128
图 16 新的邻里组织关系	156
图 17 巡逻队员在巡逻	167
图 18 平民村工作站给老人送围巾	175
表 1 平民公共聚会空间	47
表 2 四委一办的组织结构	196
表 3 活动者对会馆是否能提高生活质量的看法	215
表 4 邻里组织分类	274

导 论

2000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被当地的报道人引着，走入上海一个叫做平民村的里弄开始我的田野调查。沿着宽阔的鲁班路一转，我们就拐进一条狭长的弄堂。弄堂很窄，后来我知道居民把这样的弄堂形容为“伸手就可以从这家摸到对面家里去”。弄堂里没有灯，我们只能借着各家各户没有关严的门缝或者窗户沿透出的光，摸着黑往前走。在这条过道里，我们碰不到一个人，大概走了两分钟，前面突然一亮，我们拐到了一个破旧的几乎要倒的房子，这就是居委会所在地。居委会里面倒是灯火通明，有居民在看电视，也有值班的居委会干部在和居民聊天。看到我们来了，看电视的居民（后来我知道她是租住在这里的外来农民工的家属）羞涩地赶紧走了，而那聊天的居民却赶紧迎上来。后来我知道他是附近一个工厂的普通干部，我们叫他汤大哥，他是里弄里的积极分子，刚刚在居委会改革中当选为居委会副主任。他看到陪同我前来的报道人是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很高兴地买来了西瓜，很神气地和报道人讲起他作为一个居民参与居委会工作的体会，而坐在一起的居委会社工主任则显得既紧张又兴奋。后来我才知道，虽然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办公室之间，走路的话不过十分钟的路程，但街道办事处的大部分干部却几乎从未到过这个地方。虽然在这之前，我在上海已经待了三年，但也从未见过这么陈旧的地方。在那个晚上，冷清黑暗的弄堂，灯火通明的居委会办公室，挤在居委会看电视的农民工，热情洋溢的居民积极分子，以及居委会社工主任和街道办事处官员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张力，

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开始理解它们对于我所关注的邻里公共生活的形成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从 1996 年底开始对上海市的城市街道进行调查，对城市邻里的探索同我对转型中国的研究志趣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内地在过去 30 年里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逐步卷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也孕育着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公共道德的危机，有关社会公正和良知的议题不断被提起。同时，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战略也使得劳资关系、城乡关系乃至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都持续恶化，这种恶化开始直接或间接地危害到每一个人^①。这些社会冲突导致人们对国家原有的治理体制不满。虽然相对停滞的政治体系仍然能够控制整个国家，但是底层社会的抗争却层出不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地方政治的稳定。

城市在王朝时代曾经是地方政治经济的中心（Skinner, 1977）。而在当代，中国城市更是权力变迁、冲突和抗争的集中地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城市基层的社会资源被控制在单位^②的手中，邻里被置于权力空间的边缘，附属于单位。国家通过对单位的控制，从而有力维持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市场体制的发展以及政企分开的行政改革，单位制度逐步分解。许多原来由单位承载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乃至政治凝聚的功能，逐步转移给地方政府。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缺乏足够的财政承担这些职能，这些工作就像通过一个漏斗一样，层层漏到基层政府和它的代理机构居委会的身上。这些基层政府的代理机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管理的恰恰是那些位于权力边缘地位

① 社会正义、公共道德和环境保护成为社会媒体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普遍关注的三个热点问题，请参见茅于軾（1997）等。

② 单位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城市的基本组织体系，既是人们获取资源的保障性工具，又是个人进入社会的重要通道。参见刘建军（2000）。

的邻里。它们资源缺乏、权力微小、能力不足，却承载着大量的社会职能，这就自然造成了邻里社区管理的混乱和低效，这些混乱和低效也引起居民对社区的不满。

不仅仅由于单位制度的解体，单位之外流动人口的增加也使得邻里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中心。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各个城市的人口也在相互流动，许多没有户口、没有单位的城市移民利用各种空隙扎下根来。在邻里生活中，他们与原有的居民在文化上相互不适应。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和外来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同样使得邻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使邻里进一步得到广泛关注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城市大规模改造和城市化进程。无论是动迁前对居民的动员，动迁过程中对居民的管理，还是动迁后对居民的安置，政府和房地产发展商都要依赖邻里间的政府组织来获得支持。而当城市改造和建设损害到原住居民的权益时，冲突和抗争便会产生。

除了邻里外部的这些因素外，邻里内部的市民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也同样使得邻里社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房地产走向市场，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使得人们对邻里社区的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房子及房价在市民的个人财产观念中处于非常核心的地位，因此维护居住权益成为他们生活中日趋重要的一部分。

这些宏观的整体的变迁和个体的微观的需求变化交织在一起，使得邻里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变迁、冲突和抗争的一个重要空间。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邻里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里弄是典型的上海邻里社区。它与北京的胡同、广州的巷子相似，但在建筑结构和类型上却有所不同。旧式的里弄是石库门和棚屋，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逐步出现许多老式公房和新式公房构成的新式里弄，80 年代以来随着单位集资建房和商品房的建设，出现了许多新村和小区。虽然建筑模式已经大相径庭，但里弄在许多

地方仍然作为邻里社区的象征，出现在各种门牌号上。这些年来，里弄里的矛盾和冲突集中表现在社区生活质量下降、污染、强制动迁、公共用地占用、老龄化等问题上，在这些矛盾和冲突中，许多传统的居民组织不得不因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而被迫发生改革，同时新兴的市民团体也应运而生。不仅如此，居民还自发地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或者保护自己的居住权益。这些组织和行动所构成的压力也推动政府基层行政的改革。但是，这些新兴邻里组织和运动为什么会出现？它们的成员又是怎样行动的？这些实践如何影响着邻里社区的公共空间的解体和重建？更进一步，这些分散的，非政治的，与传统性的邻里、家庭紧紧相连的市民组织与行动包含着怎样的权力关系，与中国的政治变迁又有怎样的关联？在这项研究中，我试图通过对上海一条里弄居民区的民族志描述来探索这些问题。

我的研究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试图使人们能对当代中国城市的市民，尤其是工薪阶层和弱势群体居民的生活，有一个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城市邻里常常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尤其是老人、妇女、失业工人等活动的主要地方^①。这些弱势人群包括下岗工人、流动人口、残疾人、重病患者等相关的都市贫困群体。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这一底层人群急剧地增加，他们逐步失去原来的相对较高的地位，在改革的话语中被置于边缘的位置。有关城市工薪阶层和弱势群体的自我组织、集体行动以及国家权力对他们的渗透和控制都很少被触及。这项研究试图对他们的邻里生活进行深入的描述。

而我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揭示中国城市基层社会中地方权力的文化逻辑。20世纪80年代以来，权力的概念已经从政治人类

① 邻里被弱者垂青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芝加哥学派的帕克指出：“有能力者大多深深地局限于他们已经选择从事的人类经验的某些狭小的领域，对于他们居住的那个地理区域里的利益反而漠不关心。”（帕克等，1987：1）

学进入人类学理论的核心部分。权力和抗争经常被作为相互对立的部分加以区分。而本研究将权力和抗争置于同一实践过程中加以考察，尤其着重分析在当代转型中国，国家权力如何通过组织、象征、制度和代理人的行动与话语渗透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它如何限定抗争的实践和话语，而抗争又如何在实践中成为自下而上的力量促进国家权力形式的变革，并改变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运作方式。在邻里中这种权力和抗争的关系，集中体现在邻里的市民组织和居民的集体行动中。通过对这些组织和行动自身的考察，可以揭示地方权力的具体运作形式和相互关系。

当然，当代中国城市中邻里空间的变迁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城市的变迁以及整个中国宏观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的，因此我的研究的第三个目的是试图从更大的范围里探索当代中国民主化道路尤其是基层民主化的动力机制。权威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引起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广泛关注。民主化的过程通常被看做是政府精英人物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者群众自下而上的抗争。在中国，由于缺乏政府之外的中层机构，以及人们对长期动乱和社会无序的历史记忆与恐惧，人们有理由担心激进的民主化过程可能带来的社会失控。因此，怎样找到一条和平与渐进的道路来推动中国进一步的民主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市民社会^①理论的引入引起广泛的讨论。那些似乎类似于西方公民社会定义的全国的非政府机构、政治抗议运动和独立的私营资本虽然引起

① 市民社会是英文“civil society”的中文翻译。在台湾地区被译作民间社会（邓正来，1996），中国大陆译为市民社会则力图与台湾地区强调对抗的民间社会以及东欧转型中的公民社会相区别，但是因为市民社会在西方传统中也常常被视为主要与资产阶级或者城市市民相关联，很容易将广大的农村社会排除在外。公民社会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演变成为政府系统、市场系统之外的第三类社会关系总和，而不再仅仅包含与国家相对抗的含义，而且随着大量国际发展机构以及国际NGO进入中国，因此在20世纪中后期，“公民社会”概念被广泛应用。本书采用公民社会概念，但在原文引用中仍使用“市民社会”一词。

热烈的讨论，但是并没有如主张者那样真的带来明显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而另一方面，那些不以民主化为目标的非精英的市民团体和底层社会运动还没有引起广泛注意，其所带动的公民文化的变化，学者更是缺乏深入的理解。我的研究将关注这一点，探索这些市民组织和社区的集体行动对中国基层公民社会的建构以及对公民文化的贡献。

总之，我试图通过对上海里弄的研究探讨 1980 年以来上海邻里中的市民团体、居民运动和相关的地方政府的实践过程。其核心问题是，在当代中国的城市邻里社区，这些平行的基层组织和集体行动是如何在国家的总体化权力和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文化的影响下生产出社会的公共空间来，而在这些组织和行动的建构中又暗含着怎样的权力关系的变迁，与中国政治社会的总体转型有着怎样的潜在的联系，同时这一公共空间的变化又如何推动居民的公共文化的转变。

一 理论综述

（一）国与家之间：有关另类的公民性

本研究主要关注的理论问题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在中国政治发展理论中，市民社会被看做一种关于中国社会新的社会变迁的动力或者解释模式进而引起广泛的争论（Rowe, 1984, 1989, 1990；Rankin, 1986；Strand, 1989；邓正来、景跃进, 1992；俞可平, 1993a, 1993b；方朝晖, 1993）。当我们关注市民团体或居民运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这一理论加以反思。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来自西方启蒙时代个人主义的理念。尽管理论各有不同，但它们基本上都强调一个独立于国家或者旧的宗族和封建纽带的个人行动自治空间的存在。这一理论概念在强调尊重国家权威的同时，也强调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空间的存在，它包括人们以非政府形式的政治参与所组成的公域和个人之间家庭生活、经济和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私域（Held, 1987；Maier,

1987)。而通过黑格尔、洛克、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的发展,个人主义成为市民社会的核心理念,由志愿组织等公民团体组成的公共领域成为市民社会的核心(Habermas, 1989)。公民社会的这种公共领域理论不但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而且还强调规范性(normative),由此形成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类公民社会价值取向。前者强调维护个人权利,限制国家的权力(Metzger, 1998);后者则强调促进公共参与,推动公共领域。

在中国,很早就有与公民社会相关的热烈讨论,人们从重构马克思主义、公民权利以及新权威主义等角度来讨论市民社会问题(He, 1997)。虽然市民社会的缺乏被看做民主化运动失败的原因(Wasserstrom 和 Perry, 1994),但是也有学者力图证明市民社会在晚清和近代社会的存在。他们试图说明哈贝马斯所论的公共领域在中国真实存在,尽管不是完全的市民社会(Rowe, 1990; Brook 和 Frolic, 1996; 鲁品越, 1994; 戚瑜, 1993)。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指出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的退出,公民社会开始出现(He, 1997; Vermeer, Pieke 和 Woei, 1998)。而与之对立的观点则指出,在权威主义文化中没有真正的市民社会和类似这样的组织(如 Wakeman, 1993; 谢维和, 1993; 孙立平, 1994; 肖功秦, 1993)^①。而且由于受到国家回归主义思潮的影响(Evans, 1985),一些学者更强调国家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时和兴, 1996; 张静, 2005),构成法团主义思潮,其核心思想就是把各种利益群体整合进国家系统,使其受到国家控制和约束。

可以说,在历史上有无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和当代转型中国能否建构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成为当时有关公民社会争论的两条主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讨论中,邓正来、景跃进的《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一文试图超越西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

① 关于中国市民社会问题在汉学界引起的讨论,可参见 *Modern China* (Vol. 16) 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夏季刊。

义思潮的对立，而明确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说，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有限干预以及市民社会本身应该与国家进行互动。在邓正来、甘阳等人的推动下，“互动说”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主导性解释模式，俞可平等进而提出建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主张，指出市场经济改革的最大影响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崛起”（俞可平，1993b）。俞可平其后更主张通过这种新型的公民社会来推动治理的变革乃至民主的运转。

强国家强社会的良性互动论占据主导地位，说明西方舶来的公民社会概念在中国主要被视作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的动力工具，而非非要出现一个独立于国家、和国家平起平坐乃至对抗的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使得在现有的中国政治情境下公民社会的发展存在可能，但是这种理论解释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弱点。一方面它假设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立的重要性，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事实上我们很难去划定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国家的权力在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加以渗透。与西方最明显的差异是，中国这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是非制度化也非正式的，缺乏国家法律的保障，独立空间的存在依赖于国家的忽略或者默许，很容易因为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消失（陈家建，2010）。同时一个更重要的区别是，中国社会的组织基础并非个人主义。虽然个人主义的兴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但个人主义并没有成为社会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划分很难套用到中国情境中来^①。同时目前的公民社会理论常常有过强的道德倾向，公民社会常被描述成完美的理想社会，但这缺乏足够范例的支持。正如 Metzger（1998）指出的，中国的市民社会话语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因而很容易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一种乌托邦和道德

① 不仅仅在中国如此，这一理论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也受到来自其他非西方社会的经验研究的挑战（Hann 和 Dunn，1996），即使是在当代西方，亚当·斯里格曼（Adam Seligman，1992）也指出这个概念的基础在这两个世纪中被消解了。